

代际关系

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研究

DAIJI GUANXI

DUI LAONIANREN SIWANG FENGXIAN
YINGXIANG YANJIU

◎ 李春华 吴望春 著



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 风险影响研究

李春华 吴望春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研究/李春华, 吴望春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682 - 2530 - 4

I. ①代… II. ①李… ②吴… III. ①家庭关系 - 影响 - 老年人 - 死亡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0158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0.5

字 数 / 197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1.00 元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本著作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项目“健康老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71110107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改善老龄健康保障机制和科学管理效益的研究”(71233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二“健康老龄化——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及有效干预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71490732)的成果之一。



QIANYAN 前言

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从未来趋势来看,我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冲击了原来稳定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的失衡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研究我国当前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有关代际关系理论方面,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西方的工业化背景下,人口学界对由家庭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人口变动格外关注,涉及代际关系的理论主要有杜沃尔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凯德威尔的“代际财富流”理论。而来自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现代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示范效应等。在国内理论方面,众多学者从我国的儒家文化出发,形成了文化人类学的反馈模式、家庭社会学的责任伦理、血亲价值论和社会心理学的需要理论等。国内外理论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点。结合国内外的代际关系理论,本研究假设和睦的代际关系降低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本研究采用 CLHLS2002—2011/2012 年的追踪数据,使用倾向值加权方法、frailty Cox model 来寻找代际关系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和机制。

本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包括亲子代际关系、婆媳关系和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在代际关系一章,从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和代际互动三个方面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之后将这些代际关系放入同一个模型进行考察,发现同在一个模型中考察与分开考察的结果有所不同。在婆媳关系一章,从媳妇提供的帮助、婆媳同住两个维度来考察婆媳关系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媳妇帮助有助于降低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婆媳同住在 2002—2005 年样本中显著降低了女性



老人的死亡风险，而在 2002—2011/2012 年样本中却作用不显著。在居住安排变化一章，考察居住安排的动态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得到结论为由同住变为不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最高。在上述三章的最后部分，都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年龄和城乡样本进行深入考察。通过总样本和分样本的考察，总体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最后一章，就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贡献进行归纳总结：一是全面考察了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二是发现同住在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中的特殊作用；三是分年龄和城乡对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做更细致的考察；四是使用倾向值加权以及 frailty Cox model 方法解决了样本选择性和异质性问题，得到了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净影响。



MULU

目录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1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3
- 第三节 框架结构 / 4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 6

- 第一节 代际关系理论文献回顾 / 6
- 第二节 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 / 14
- 第三节 主要进展与评述 / 21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23

- 第一节 研究框架 / 23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25
- 第三节 数据来源 / 26
- 第四节 变量测量 / 28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31

第四章 亲子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 35

- 第一节 子代支持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 35
- 第二节 亲代支持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 42
- 第三节 代际互动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 45
- 第四节 亲子代际关系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 49
- 第五节 亲子代际关系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 / 55



第六节 城乡亲子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 63

第五章 婆媳关系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 73

第一节 媳妇帮助与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 / 73

第二节 婆媳同住与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 / 79

第三节 婆媳关系讨论 / 90

第六章 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 92

第一节 居住安排变化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 93

第二节 居住安排变化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 / 98

第三节 城乡老人居住安排变化及其死亡风险 / 104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 111

第一节 主要发现与贡献 / 111

第二节 本文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 116

附录 CLHLS2002 年调查问卷 / 118

参考文献 / 141

第一章

研究背景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达到总人口的 10% 或者 65 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7%，即视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6.96%，基本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标准。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更加严峻。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11），比五普上升了 1.91 个百分点，达到了总数 1.19 亿左右的规模，而到 2014 年年末为 1.38 亿左右，占总人口的 10.1%，首次在百分比上突破两位数（国家统计局官网，2015）。对于我国未来老龄化趋势的预测，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在中等或低生育水平及死亡水平假设下，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于 2050 年达到 3.3 亿，届时将占总人口的 24% 以上（Zeng et al, 2010；联合国人口司，2014）。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摆在现在和今后的一个重要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冲击了原来稳定、平衡的代际关系。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社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老人作为经验的掌握者拥有很大的威望，加之传统文化中的反哺观念以及对孝道的提倡，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极高。老人在子女年幼时倾力抚养，而成年的子女特别是儿子对老人有赡养的义务，老人多个儿子中的某一个往往与老人同住，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照料老人，那些即使不与老人同住的子女也负有在经济上赡养老人的义务



(Morgan et al, 1983; Martin. Linda G., 1988; 杨菊华等, 2014)。因此, 传统社会中老人得以赡养并代代相传, 代际关系是平衡的 (Myers et al, 1982; 张纯元, 1983; 王瑞迎等, 1986)。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童欣, 2005), 年青一代比父代更容易掌握和适应工业化的知识和技术, 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 子代逐渐取代亲代占据家庭“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与此相应的是价值观的转变。现代的人们越来越向往独立、自由的生活, 孝道观念越来越淡薄 (李鹏军, 2008), 年青一代赡养老人的主动性越来越低。另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 城乡生存压力加大, 在有限的资源下, 资源更多的是流向子代而不是亲代, 使本来就稀缺的家庭养老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石金群, 2013)。其实, 不仅是养老物质资源变得稀缺, 养老的人力资源也变得更为稀缺。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开放, 职业间和地区间的人才流动逐渐增强, 就业压力和竞争日益加剧。在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 大量中青年突破“父母在, 不远游”的禁忌, 远离家乡外出工作, 在家庭赡养的人力提供上明显不足。不仅如此, 由于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 (魏下海等, 2012); 当今社会抚养子女的成本增加, 很多年轻夫妻不愿多生育孩子, 家庭养老的提供者明显减少 (Gustafson et al, 2014; Feng, XT et al, 2014); 预计到 2050 年, 我国无子女的老年人比例将超过 10% (王广州, 2014)。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家庭规模的缩小, 代际间的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Cartier et al, 1995; Zeng Yi et al, 2003; 曾毅等, 2004)。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 自我国人口普查以来, 家庭规模都在不断地缩小, 而家庭数在增加; 空巢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 而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越来越低 (曾毅等, 2004; 曲嘉瑶等, 2011; 张丽萍, 2012; 曲嘉瑶等, 2013; 周长洪, 2013)。因此, 我国现代的代际关系表现较之前有所失衡。

我国现代代际关系的失衡对老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 家庭权威结构由以前的“上下”型转变成“下上”型, 因此, 有的老人不但得不到赡养甚至被“啃老”或“榨老” (车茂娟, 1990; 肖群忠, 2002; 阎云翔, 2006; 李洋等, 2013), 有的甚至被迫无奈自杀 (陈柏峰, 2009; 王萍等 b, 2011; 刘燕舞, 2014), 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甚至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其次, 在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影 响下, 许多家庭内部由过去的双向抚养模式变为单向抚养模式, 子女不再对



年老的父母负责，只对自己的后代负责，引发了对父母赡养功能的弱化，使主要依靠家庭/子女养老的老人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晏月平等，2013）。有学者根据2010“六普”长表中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数据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口失能率随着年龄上升而快速上升（潘金洪等，2012），随着家庭供养者的减少，可以预计，若无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的帮助，老年人的健康会越来越恶化。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后代对老人的生活照料过多不仅容易使老人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和无用，而且会产生一种“用进废退”效应，老年人越是养尊处优反而对其健康更不利（张文娟等，2005；宋璐等，2006）。最后，老人居住安排方式的变化使得老人的日常照料资源减少，对于失能老人大为不利。特别是家庭的空巢使独生子女的老年父母饱受精神空虚和心理孤寂的折磨，产生因健康恶化而带来的更多照料需求和医疗风险（于长乐等，2009）。但是也有研究指出，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子代或亲代有条件拥有自己独立的居住空间，从而使原本就不希望同住但限于经济条件无法另外买房的两代人有了分住的可能，降低了代际冲突，从而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魏章玲，1990；Unger，1993；John R. Logan et al，1999；穆光宗，2002）。

由此看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代际关系在这一转型时期发生了变化，也由此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了影响。在当前对代际关系变化对老年人健康或死亡风险影响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那么，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健康或者死亡风险到底产生了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另外，代际关系的面向众多，不同层面是否对老年人健康或死亡风险有着不同影响？其作用机制又如何？这些问题，将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使用 CLHLS2002—2011/2012 年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二是考察其中影响的机制；三是应用倾向值加权以及虚弱风险模型（frailty Cox model）方法对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有以下五点：一是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克服了以往多从子代支持单一维度探讨的局面，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亲



代支持和代际互动上,以此覆盖了代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思路,而且丰富了老年人健康研究的理论体系。二是将代际关系扩展到由姻缘引起的代际关系——婆媳关系,进一步拓宽了代际关系研究的范围。三是不仅考察静态的代际关系层面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而且从动态的居住安排变化方面进行考察,从动和静两个方面全面把握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四是基于以往研究多关注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例如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健康自评等方面,很少延伸至健康的终点——死亡上,本研究将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连接起来,进一步丰富了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研究的内容。最后,本研究尝试使用多种统计方法,力争厘清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作用强度,实现了对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将国内外的代际关系理论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研究相结合,有效地运用我国最新调查数据,全方位、多维度地探测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以期为有关部门在宣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改善代际关系、制定和实施有关老年人健康政策时能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第三节 框架结构

围绕研究主题,本论文将分为七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先是阐述老龄化和代际关系变迁的背景、代际关系变化给老年人健康和死亡带来的不利影响,然后阐明本研究的目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最后交代本论文的结构。

第二章,首先介绍代际关系定义,然后分国内外文献对有关代际关系理论进行梳理。在国外文献部分,从人口学、人口社会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流派进行阐述;在国内文献部分,从人类学、家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流派进行考量,并对有关理论在我国的解释力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梳理。随后把有关的实证研究从子代支持、父代支持、代际互动和居住安排等代际关系方面对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进行梳理,以期找到一些规律。在此基础上,引出本研究的设计和假设。

第三章,简单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数据质量,然后对本研究使用的代际关系变量进行操作化及变量的形成进行介绍,最后就本研究



主要使用的 frailty Cox model 和倾向值加权方法进行相关的介绍。

第四章，首先，从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和代际互动 3 个维度来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其次，将这 3 个维度的代际关系放入同一个模型进行考察，试图发现总模型和分模型之间的异同点。随后，分年龄和城乡样本进行代际关系与老人死亡风险的考察。

第五章，从媳妇提供的帮助、婆媳同住两个维度来考察婆媳关系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年龄（媳妇帮助部分除外）和城乡样本下婆媳关系是否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有不同作用。

第六章，从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角度考察代际关系动态变化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分年龄和城乡样本进行考察。

第七章，从研究内容及方法上就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创新之处进行归纳总结，以及讨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第一节 代际关系理论文献回顾

在这一小节，先就本研究使用的代际关系定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国内外两部分就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回顾，最后对文献回顾进行简要的评论。

一、代际关系定义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家庭生育职能时就谈到了代际关系内容。他们认为，家庭的生育职能在于后代的繁衍，并由此形成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等，1972）。在搜索文献的过程中，尚未找到国外学者对于代际关系的确切定义。只是发现，他们多将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作为一个现成的概念加以使用，或者将其放在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hip）之中加以考察（Catherine E. R. et al, 2002），或者认为它是社会支持中的一个分支，称之为“代际社会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Glenna Spitze et al, 1990；Merril Silverstein et al, 1994；Xuan Chen et al, 2000），或者与正式的社会支持相对应，是一种“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Stoller, 1985）。简言之，国外学者多将代际关系作为社会/家庭关系下更微观的一个概念直接使用。

在这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较为详细和深入。有学者认为，简单而言，代际关系就是代与代之间的相互关系（廖小平，2009）。有学者则明确指出代际关系是一种纵向的家庭关系，它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由共同生活的几代人构成的重要的家庭关系。它包含由夫妻关系派生出来的基本



的亲子关系,以及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密切相关的婆媳关系,或隔代的血缘关系——祖孙关系(潘文岚,1999;王跃生,2010)。在我国传统家庭中,历来是亲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传宗接代”是家庭存在的重要依据,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国家庭与西方家庭不同,西方家庭以夫妻关系为主,我国家庭以亲子关系为主。亲子关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二是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前者是一种骨肉情感,后者是一种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王恒生,200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子代对老年人的赡养决不仅是经济上的供给和生活上的照顾,还包括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以及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潘允康,2002),进一步明确了代际关系的内容。有学者指出,家庭代际关系不仅限于“家内”,而且存在于“家际”之间。“家内”指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的成员组成一个生活单位,形成不同类型的代际关系;“家际”指具有亲子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并不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单位内生活,但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王跃生等,2011)。前者是狭义的同一个屋檐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后者是广义的包含老人和分住子女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学者对代际关系的定义都强调生物学的特点。有学者在代际关系的自然属性/生物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还有以社会文化属性为基础的代际关系,后者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世代和代沟等问题上,研究不同代人在文化上的传承和断裂(沈汝发,2002)。无论学者们在属性上将代际关系区分为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代际关系视为社会结构的被动后果。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从家庭策略的角度去动态理解代际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成员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一种主动安排,家庭代际关系会随着父母与子女在不同生命阶段所掌握资源以及需求的差异而变动(刘汶蓉,2012)。

本研究采用生物学/自然属性范畴的代际关系定义,指上下代之间所形成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具体包括不同代际家庭成员之间所形成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交流和相互之间的互动。本研究的代际关系既有狭义的(与同住后代的关系),也有广义的(与不同住后代的关系);既包含由血缘形成的亲子代际关系,又包含由姻缘引起的代际关系,例如婆媳关系。



二、国外代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文献

在代际关系研究方面,国外理论主要有社会学和人口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流派。

国外人口学界对家庭关系的关注较早。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早于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育率的下降等,家庭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使人口学界对由家庭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人口变动格外关注。人口学界开始将家庭纳入研究的视野,早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家庭结构、婚姻关系及生育等方面。联合国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与后果》(United Nations, 1953)一书在提到家庭的作用时较早地提到了代际关系内容,认为家庭在抚养和赡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阐明了在一个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有抚养和赡养的关系。哥立克于1947年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理论,研究家庭从组成到解体的变动发展规律。他认为家庭像人一样经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物历程,在享受各种权利的同时履行各种义务,例如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当然,由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只是针对核心家庭而言,并且只考虑到单向的代际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扩大家庭及家庭内部的反馈关系而备受一些争议(Glick, Paul C., 1947)。

与上述人口学在较宏观的角度论述代际关系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人口经济学家凯德威尔使用“代际财富流(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Flow)”概念从微观层面来阐明代际财富流动的方向和人们生育数量的关系(Caldwell, J. C., 1981)。凯德威尔认为,在传统社会,财富流动的方向是单向向上的,即幼辈的财富流向长辈,子女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生育子女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助长了社会的高生育率;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单向向下的财富流向,生育子女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因此,社会出现了低生育率。尽管凯德威尔使用代际财富流的目的是解释代际财富流动的方向与人们生育数量的关系,但此中也包含了对代际关系中物质财富流动的分析:在传统社会中后代给老年人提供物质帮助,而在现代社会中却不再提供或很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与人口学者主要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代际关系的研究不同,来自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者主要从权力的下降和社会交换等角度切入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围绕现代化过程中老年人地位的下降,弗雷德·科特利尔



(Fred Cottrell, 1955)、利奥·西蒙斯 (Leo W. Simons, 1960) 和考吉尔等人 (Donald. O. Cowgill et al, 1972), 使用现代化理论对老人的权力下降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在传统社会中, 从产业特点和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 父辈凭借着丰富的养殖、种植经验掌握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权力, 成为家庭威望和权力的重心。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年长父母对经济、知识等资源的控制下降, 他们从子女处获得的支持也就相应减少, 或者老人们能与后代讨价还价的资本变小, 从而得到的支持就少 (Goode, 1970)。古德提出的理论称为“权力-竞价模型” (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 又译为“权力与协商模型”), 从现代化过程中老人地位的下降引致的后果进行分析。也有学者从女性参与有酬劳动的角度进一步将现代化理论进行挖掘, 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 无论是获得的教育程度更高还是观念的更新, 越来越多的女性逐步脱离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投入有报酬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去, 这样使女性照顾老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使老年人得到的支持下降 (Mason, 1992)。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现代化理论是在时代变迁背景下, 对代际关系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做出的种种解释。

社会交换理论对于代际关系的论述较为丰富和庞大。围绕着交换动机的不同, 对代际关系的研究又发展出三个亚理论。首先是合作群体论 (Corporate Group Model)。考克斯 (Cox) 认为,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犹如合作群体, 代与代之间存在的利益共同性使跨越时间的契约得以实施, 在家庭这一合作群体里, 父母向他们的子女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劳务和情感, 并能从这种投资中获得子女的回报。这种理论是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 认为代与代之间的交换遵循互惠互助的理性交换原则, 即父母向子女提供支持隐含着日后子女必须对父母给予回报, 由此, 父母会向高收入的子女提供支持以图得到子女更大的回报 (Cox, 1987; Cox D et al, 1992; Silverstein M. et al., 2002)。其次是互助模型 (Mutual Aid Model, 又译为“互助论”)。与考克斯的合作群体论不同, 这种交换是互助和自愿而非算计的, 如父母提供照看孩子、做家务以及提供住房等资源的共享等, 而子女在父母年老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 (比如, 生病需要医药费等) 会提供经济上的援助。父母之所以能得到家庭的支持, 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在向他人提供这些方面的支持。这是一种代与代之间互助的模式 (Lillard et al, 1997)。最后一种是利他主义 (Altruism Hypothesis)。与合作群体论和互助模型相比, 这种代际间的交换模式更倾向于强调交换的动机是不考虑获得